

作为预言和表征的“打工文学”^{*}

杨立青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广东 深圳 518028)

[摘要]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等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跃进式的城市化进程奠定了基础,从而也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前来就业,导致20世纪80年代“民工潮”的出现。农民工生存状况随之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打工文学”正是以文学的方式对此作出的一种确凿回应。正如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等作品所揭示的,“打工文学”通过讲述离乡打工者的故事,呈现进城打工生活的挣扎和希望,创造了一个独特而普遍的表象世界,昭显了现代人流徙、离散的命运。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打工小说”逐渐衰落的同时,“打工诗歌”开始崛起,其主题惊人地一致,那就是陈述打工生活的苦难,成为“底层人的歌唱”。农民工等社会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日益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结果。作为既嵌入又疏离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去组织化”的个体,打工者其实对应了在当代中国个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构,而由其心理、情感和生活情境构织而成的“苦难叙事”及文学表现,则是在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理性与情感的张力之间流离漂浮、摇摆挣扎的无根个人时代到来的一个预言和表征。

[关键词] 改革开放 深圳 农民工 打工文学 去组织化 苦难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3)06-0136-12

美国学者加拉格尔在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劳工问题时,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同所有制的劳动实践会变得越来越相似”,她认为这是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及其带来的竞争压力所致,并由国家主导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所驱动。^{[1](P6-7)}“打工文学”所呈现的劳动实践恰好就是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最早在珠三角地区落地生根后的结果,它以情境化这一新现实的文学方式,构成当代中国社会走向的一个预言性存在。在其身上,预示着一个难以逆转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开启,折射了个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新塑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工潮、

下岗潮以及由此催生的“底层叙事”,都与此息息相关,并成为人的现代命运的一个表征。

一、讲述打工者的故事：“打工文学”及其开山之作

众所周知,我国1978年底开启的改革开放,在城市领域是从经济特区开始的。1979年7月,深圳蛇口炸山填海的开山炮,标志着中国大陆第一个外向型工业区的诞生,掀开了此后经济特区大开发、大发展的序幕,对外明确释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信号。从1979年到1984年短

收稿日期:2022-11-08;修回日期:2023-09-13

*基金项目: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文学研究中心课题
作者简介:杨立青,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文化、文学研究。

短五年间,蛇口由一片蛮荒之地变成了一个道路通达、厂房林立、外联内引、按市场经济逻辑运作的现代化工业区。

“厂房林立”,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关于工业化的一个集体想象,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帧充满诱惑性的“风景”^{①[2]}。只不过蛇口工业区的“厂房林立”显然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它的定位是外向型工业区,以境外招商引资为主,同时其工人招募与实行统调统分的人事管理方式的公有制企业截然不同,实行的是聘用制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的浮动工资制;相应地,这也意味着依附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福利制度被剥离——这是引入了新的不稳定就业、社会福利和企业管理改革的结果。相比于以往的正式工人,这一日益庞大的工厂就业群体,被称为“临时工”或“新工人”,“被吸收到外商投资部门和中国沿海开发区的工人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没有经验,不熟悉社会主义企业的劳动实践。来自中国更贫困的内陆地区的移民女工经常构成外商投资企业生产劳动力的主体”^{[1](P19)}。由于这一新的工人主体主要来自广大农村,他(她)们很快就被一个新的身份称谓所取代,也就是“农民工”^②。

由此,经济特区外向型经济及随后三资企业、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意味着借助外力和自身“人口红利”的中国第二波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我们在毛泽东时代经历了第一波工业化,那一波工业化农民做了很大贡献,农业对工业有很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波工业化,我们的贡献主体还是农民。经济学家一直说中国的劳动

力人口“红利”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很多外国经济学家说这一波全球化就是西方的资本+中国的农民工。加入WTO之后很多年里,光是珠江三角洲每年都吸收了3000万农民工,长江三角洲也差不多。最近几十年,美国的技术在进步,资本在扩展,但是美国的就业并没有增加。那么,美国的工人阶级在哪里?我们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就是美国的工人阶级。^[3]

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全球性转移这一宏阔背景首先为深圳等珠三角地区的新型工业化提供了驱动力,进而也为其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奠定了基础,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库哈斯甚至称后者为珠三角的“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在这一速度和规模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发展进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构成了相互促进、彼此成就的关系,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支撑性的社会条件之一,是城乡人口的加速流动,也即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民工潮”。^{③[4]}

现在已难以估算改革开放后民工潮的总体规模了。但作为40多年来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民工潮的兴起、流变特别是进城民工的生存状态已成为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打工文学”正是以文学的方式对此作出的一种确凿回应^④。在政治经济学之外,打工文学在社会、文学(化)史上的意义,迄今尚未得到应有的深入揭示。而我们对此的讨论,不妨从一篇被称为打工文学的开山之作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开始。

这篇讲述打工者故事的小说发表在1984年的《特区文学》上。在小说的第三人称叙述中,传统古板的主人公打工仔陈可化,因工厂严格

①炳谷行人认为“风景”是一种现代认识性装置,在工农阶级翻身成为历史主体的政治语境中,“社会主义风景”的展示实际上也是阶级话语的视觉实践,阶级认同是查探这一风景形态内部机制最为重要的通道。参见王炳中论“十七年”山水游记中的“社会主义风景”[J].文学评论,2022(1):179-187。

②“农民工”一词的起源,似乎已不可确切考证,但显然与20世纪80年代年轻农民到珠三角“打工”这一行为有关。“打工”一词来自港澳(如香港歌手许冠杰风靡一时的粤语歌《我们这帮打工仔》),在它身上,蕴含着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

③吕新雨指出,民工潮实始于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晚清工业化时期,80年代的民工潮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只是重演的故事。参见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J].读书,2003(10):52-61。

④本文不对“打工文学”进行严格界定,因“打工文学”本身是个含义相对模糊的称谓,一般认为它是指在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兴起的进城打工者书写打工生活的文学。

的奖惩制度而心神不宁,当他被工厂委以重任接替领班工作时,他对自己的能力信心不足而犹豫不决,深夜在海边徘徊。他一度产生了辞职回乡的念头,但最后受深圳美丽海景和乘风破浪的巨轮的触动,放下疑虑,不再逃避,“终于抬起头朝着万家灯火处奔去了”。这或许是个迷你版的成长故事,“讲述农村青年在城市中改变自己,从过去走向未来,告别‘传统’走向‘现代’”,与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一样,是一种对改革和未来充满乐观的“现代化”叙事。^{[5](P9)}

尽管如此,这篇打工题材小说的几个细部描述所呈现的“打工经验”及其透露出的诸多历史信息,确实可让我们指认它作为“打工文学”开山之作的地位。比如在小说中,面对违反厂规的工人范海,厂长轻咳了一声,法官断案似地说道:“这样怎么能行呢,嗯!本公司的规则,难道你还不知道?在我独资厂打工,不像内地的工厂那样自由、懒散,你另谋高就吧。”现场的陈可化对此的反应是:“五分钟,前后还不到五分钟啊!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雇了一个工人,这委实太无情了。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去对待一个工人?!陈可化目瞪口呆,脑袋嗡嗡作响,手一松,当的一声,工具掉在地上。”可以看到,“独资厂”和“内地的工厂”在此被并置起来,相比于后者在管理上的“自由、懒散”,前者无疑要严格得多,比如在解雇工人上只需要五分钟,“委实太无情了”。但这恰好就是加拉格尔所说的改革开放后新的“劳动实践”的一部分^①——对于资方而言,这一劳动实践意味着更多的管理自主权和控制权,对于“新工人”而言,这一劳动实践则意味着更不稳定的就业,更少的社会保障,工人之间更弱的社会连结,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新的劳动实践中,“竞争”成为外资工厂文化的核心,其中违反厂规的范海被解雇而追求上进的司徒辉被提升

为质量检查员,就是工人竞争的结果。同时,这一竞争文化被赋予了浓烈的暴力色彩——“搏杀”,它来自与内地不同的香港:“阿化,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要搏杀才能有出路,我不知道你们内地怎样讲,对,是讲上进心,难道你一点上进心也没有吗?”这段香港的余师傅劝说陈可化接替自己领班之职的谈话,本质上可视为港式资本主义对内地的文化规训,而后者最终听劝,则意味着这一规训的有效性,也即港式的搏杀竞争文化最终内化为打工者陈可化此后思想行为中的明晰意识——“陈”旧的观念是“可化”的,他最终决定接受现实的挑战——作者给主人公的命名高度吻合故事情节的推进,这无疑意味深长的。

但“竞争”这一新文化在陈可化的经验世界里,到底是陌生的:五分钟雇佣一个工人,他觉得太“无情”了。由此反推,在他的以往经验中,做事情要“有情”。小说开始工友们嘲笑他“不化”,预示着他固守“有情”的经验行事,他最终“可化”,则意味着他的经验必须并可以作出调适甚至根本性改变,以适应所处的外部世界对自身提出的新的“无情”要求。这里面自然有挣扎,这一内在挣扎在小说中是透过其心理活动的剧烈波动来表现的——“沙滩上,深深地印下了一串长长的、凌乱的足迹”。我们将会看到,对“陌生”的震惊体验,对精神不适、内心不安等挣扎过程的情境再现,在往后的打工文学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即便小说结尾展开的是对改革和未来充满乐观的“现代化”叙事,研究者钟晓毅在“作品不乏诗意的描写”里,依然读出了“已让人初步看到了从小农经济到大工业文明的转变中所带出的生存竞争的严酷现实”^{[6](P169)},对这一现实的揭示无疑是该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而这一生存竞争的残酷现实,和如今盛行全球的“优绩主义暴政”

^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实践被定义为一种使劳动力商品化和使劳动关系市场化(使它适合货币化交换)的措施。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建立在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等级关系基础上,这个等级关系需要不同的控制方式。参见玛丽·E·加拉格尔.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M]. 郁建兴,肖扬东,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74.

又何其相似^{①[7]}——“打工文学”的预言性质和表征功能，在这篇短小的开山之作中，可以说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揭示和呈现。

二、挣扎或希望：“打工”的文学化情境

“打工文学”的出现，有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和市场社会兴起的深刻历史语境，也是人口在城乡间大规模流动等现代移民现象的一种文化投射（因此它的英文往往被翻译成 migrant literature，即移民文学）。在现代化理论者看来，发展是一个过程，包括劳动力从低产出的边缘到高产出的中心的空间再分配，以及从中心到边缘的资源扩散——移民对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与此相反，结构主义理论者则认为，中心和边缘的交换绝不可能是一种平衡机制，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是不平等的，这种理论谴责移民既是不平等的产物，又是其根源，因为移民有助于维持空间上和部门间的不平等，而正是这些不平等促进了离开原住地的运动。^{[8](P11-13)}也就是说，空间（城市与农村）和部门（农业与工业）之间不平等的结构性关系，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移动并造就了史无前例的“民工潮”：

放下镰刀/放下锄头/别了小儿/别了老娘/
卖了猪羊/荒了田地/离了婚//我们进城去//
我们进城去/我们要进城/我们进城干什么/进了城再说（谢湘南《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首歌》）

但这种“进城”的可能前景，在“火车”这样的文学意象里，就得到了令人不安的展示：

列车终究无法将我消化/它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我吐在迷惘的站台/旅途已经结束/而流浪还没有真正开始/行李卷儿无奈地牵拉/在我风尘仆仆的背上/它的真正意义/只是一个累赘/挤在黑压压的人流/我无法盘算出将去的地方/人蛇混杂的广州啊/你今夜打算将我/如何处置（张守刚《站台》）

假如说“进城”暗含着一种生活的热望，意味着新的生活可能或社会空间的打开，那么“把我吐在迷惘的站台”，则意味着“进城”将是个难以掌控的风险旅途：“生活的本地性被瓦解了，这给许多人造成了难以估计的风险，对生活的掌控感处于莫名的威胁之中。因为影响你生活的变量是遥远、陌生而难以理解的，它们是未经你同意和授权的强大力量，却以不容分说的蛮横方式操纵你的愿望，支配你的命运，甚至剥夺你的权益，深刻地改变了你原有的生活方式。”^[9]

不过，对于农民工的生活理性而言，“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不值得留恋，尤其是在城乡比照之下，农村生活的不堪和城市生活的诱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进城推拉力。^②然而，进城打工显然又是新的生活磨难的开始：“工场里的日光灯管没日没夜地亮着，几百名女工在苍白的光线下，默默地听着缝纫机的声音，眼睛布满血丝，泪水盈盈，目光聚集在那根快得像一条线的车针上。”（林坚《别人的城市》）从20世纪80年代的林坚到10年、20年后的郑小琼，被称为“血汗工厂”流水线上的高强度劳动场景及其给农民工带来的身心伤害不仅没有改变，而且“生存竞争的严酷现实”更是得到了集束性的呈示：“这些面孔不断地涌现出来，表情不一，疲惫、睡眠

① 优绩本意为功绩、优点，是对个人成就的认可，以它为根基的优绩主义肯定了这点，并认为只要人凭借自身的才能和努力，就能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而当优绩主义将人区隔为胜利者和失败者，优绩就变成一种“暴政”，它强化了赢家和输家之间的社会不平等，构成了优绩主义的残酷性和阴暗面。参见项飙对谈迈克尔·桑德尔：我们如何摆脱“优绩主义”[R/OL].(2022-3-24)[2022-12-11].“澎湃新闻”公众号。

② 推的因素通常包括农业投入成本的升高、不发达的基础设施、不理想的环境条件、很高的人地比率、严格保守的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压抑的家庭关系等；拉的因素包括城市对待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城市的高工资、更多的自由机遇以及更好更便利的娱乐设施，以及目的地已有的同乡和亲戚构成的“打工链”。参见瑞雪·墨菲. 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M]. 黄涛，王静，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19.

惺忪、苍白、迟钝。这是我看到景象，时间是凌晨两点十分。一句在内心搁置了很久的诗突然涌入脑海：‘她们像浸水的木头浮了上来，充满疲惫’。”（郑小琼《流水线》）而最具视觉和心理冲击力的“断指”与“坠楼”更是成为被反复书写的意象^①：

将断指的手举起来/去吧，去那条大街，那条大街上/汇聚着你的同命运的人……//将断指的手举起来吧——/走过他们，走过那些从/我们的喉头里挤出超过/他们的羞耻的那些我们的血汗（苏琦《断指之痛》）

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数完就到了楼顶。/他。/飞啊飞。//鸟的动作，不可模仿。//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一道闪电/只目击到，前半部分/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郭金牛《纸上还乡》）

这是相当激越的文学表达。也有在静谧的日常生活情境下的惊心动魄：

我时常看到握着血淋淋手指头的人/急奔奔地被人拖着/来到诊所/辣辣的太阳照着/一个中午大街的安静/诊所门口的斑点狗/嗅了嗅滴在眼前的血迹/然后又继续/睡去（谢湘南《德德诊所》）

相比于社会学研究，打工文学的意义在于它对打工者的身心状况所进行的情境化模拟和想象性再现，正如华裔学者王斑所说：“作为文化表意媒介之一的文学，见证了新旧交替、现代与传统转型的焦虑。文学较之社会学更有力地揭示变化中的心理和日常生活情境。”^{[11](P223-224)}

假如说“焦虑”是文学得以生发的触媒，那么在打工文学中，主体的“焦虑”首先来自于从农村到城市的场景转换及其带来的经验断裂：

“一直以来，我对钢铁的切割声十分敏感，那种‘嘶，嘶’的声音让我充满恐惧，它来源我自小对钢铁的坚硬的信任。在氧电弧切割声里，看着闪着火花和被切割的铁，我才知道强大的铁

原来也这样脆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顽固地认为那些嘈杂而凌乱的声音是铁在断裂时的反抗和呐喊。”^{[12](P2-3)}“铁”是工业的象征，不过与作者以往对“铁”的认知不同，当她身处铁制品的生产现场，那种全新认知和震惊体验，也即由“陌生”带来的经验和情感刺激是前所未有的，“铁原来也这样脆弱”，而“嘈杂而凌乱的声音是铁在断裂时的反抗和呐喊”。

“反抗和呐喊”让人想起鲁迅笔下冷峻的底层世界。不过与鲁迅笔下受凌辱受伤害的小人物不完全相同，在叙事类的早期打工小说中，打工主体的反抗和呐喊往往被情境化为劳资双方的对峙与冲突：

我说：“我们为什么集体放假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太辛苦太紧张太机械太嘈杂……我们只是集体放假而按国际劳动法我们也是应该享受工作假日的但你们从来没有遵守劳动法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你们只是把我们看成一种机器一种能为你们赚大钱的廉价机器我们没有劳动保障待遇病倒了得自己掏钱看病请一天假还要被厂里扣掉三十元甚至被炒鱿鱼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就是机器也要修理加油所以我们要集体放假所以我们决定不干了！”^{[13](P86)}

在港方总管孙小姐面前，这段一股脑说出来的没有标点的话，是“我”情急之下克服惧怕、鼓起勇气豁出去的产物，近似于意识流，但逻辑清晰，辞严义正，极具煽动性和说服力，“我”因此树立起敢于为众多工友争权益的“代言英雄”形象——“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往日精明强悍的孙小姐突然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她恳求工人们不要“集体放假”，因为她也是打工者，误了订单交付日期她也得被炒鱿鱼——妥协的结果是每人增加30元的工资，但加班照常。这虽算不上胜利，但这场“集体放假”斗争，却也显示了在港资盘剥之下工人主体抗争意识的滋长——在张

①郑小琼在接受采访时说：“珠江三角洲有四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参见成希，潘晓凌. 郑小琼：在诗人与打工妹之间[N]. 南方周末，2007-06-28(009).

伟明的另一篇小说《下一站》中,当主人公吹雨被“香港婆”杜丽珠辱骂为“马仔”时,他不惧要挟,把手指戳在后者的鼻子上,一字一顿地说“告诉你,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桥段,为此杨宏海等研究者予以了高度评价,但李杨却认为打工仔以“一九九七”回击“香港婆”,既可能是一种“政治自觉”,更可能只是一个噱头,一个空洞的能指,一种以此解脱困厄的阿Q精神;同样地,在《我们INT》中,“我”无法在现实中反抗资本的压迫,只能在梦境里以对女主管孙小姐实现性占有的方式,发泄弱者的怨恨,挽回弱者的自尊,但弱者只能通过想象的性暴力来挽回失去的尊严这一事实,一方面凸显出现实权力格局的不可动摇,另一方面,虚幻的自慰将进一步削弱打工者直面自我、与现实并进而寻求变革的勇气和能力。^{[5](P9-10)}考虑到这两篇小说均发表于1980年代末期的事实,可以看到这种抗争意识在后来并没有转化为普遍的行动,因此也就没能改变打工者付出高强度劳动得到的却是低福利的整体格局^{①[14]}，“挣扎”成为打工文学最突出的情境或表象世界。

然而,在现实苦难中“挣扎”的同时,“打工”这一行为其实也内含了个人和家庭生存条件得以改善的“希望”。这一点受到了普遍的忽视。在《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一书中,爱尔兰学者墨菲在对江西农村进行多年的实证调查后,形成了这样有别于一般印记的基本认知:一方面,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虽会导致“生活的本地性被瓦解”,但另一方面,打工者本身是一个社会行动者,在价值观、目标和资源利用方面具有主体能动性,实际上,打工这一行为选择所带来的生活改变的可能,构成了农村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打工者的巨大动力:“在不否认城乡间人口流动带给农民的种种痛苦的同时,我认为,总的来说,涉足城市劳动力市场改善了农村的状况,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为更多的农村人口追

求其目标提供了一条路径。”^{[8](P213)}深圳市统计部门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深圳人通过邮政向全国各地汇款达131.6亿元人民币,其中有89.5亿元是参与深圳建设的外来工寄往内地的,占年度汇款总额的68.01%;统计数据还显示,1990—2004年在深外来工通过邮政已累计汇出820.5亿元,极大改善了家人的生活。^[15]

就文学文本而言,正如《深夜,海边有一个人》朦胧的光明结尾所指向的,在早期的打工文学中,除了上述“苦难叙事”,事实上还存在着一条“希望叙事”的线索,其典型案例就是“安子神话”。

安子1984年初中毕业后从梅州农村到深圳打工。她先是进了一家电子厂当插件工,几个月后进某宾馆当服务员,同时开始上夜校,此后到蛇口一家公司工作,开始接触文学并尝试写作。安子先后出版了《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等风靡一时的作品,还开设了几家公司,从一名不谙世事的打工妹跃升为老板,并成为广东省作协会员,当选为“深圳十大杰出青年”。声名鹊起之后,她四处演讲,在电台主持“安子信箱”,以自己的成功故事激励打工者努力向上。安子不仅是打工文学的代表人物,更是万千打工者心目中的偶像,被称为“深圳最著名的打工妹,都市寻梦人的知音和代言人”:

“深圳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城市,安子的道路也可视为深圳所走过的历程的一个缩影。安子的作品以其‘微笑看世界’的独特视角,表现了一种‘挑战生活、实现自我’的理想主义色彩,让百万打工者有满足心理诉求的渠道,在劳累的工作环境中得到心理平衡和精神慰藉。尽管现实生活远非如此简单,但只要生活有‘梦’,就有希望。”^[16]在杨宏海看来,打工文学“既看到了苦难,也看到了希望;既描写了血泪人生,也表现了人间温暖”。^[17]

这点不仅得到了事实层面的印证(很多打工出身的人后来都成了“成功人士”),也得到

① 聂辉华和李金波用“政企合谋”这一概念来分析矿难、环境污染等现象,它也可用来分析农民工生存状况。参见聂辉华,李金波. 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J]. 经济学(季刊), 2007(1): 75-90.

了张颐武的理论呼应：“在我看来，打工文学凸现了我们再思考‘底层’或弱势群体问题时的一个关键盲点。我们常常忽视，二十年来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正是一个依靠自己改变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这个新的‘中国梦’是一个成功的梦，一个凭自己的勇气、智慧、创造精神争取美好生活的梦，一个充满希望的梦想。这是一个强者的梦想，一个人冲向未来的梦想。这正是中国社会尽管面临巨大挑战却仍然能够凝结成一个社群，而没有分崩离析的基本前提。”^[18]

然而，假如说苦难和希望并存于早期的打工文学，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庞大打工群体的情感共鸣，从而形成一个蔚为大观的“文学现象”^①，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打工文学特别是打工小说却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和分化：一方面是市场化和通俗化，很多打着打工文学旗号的书报刊讲述色情与暴力，成为地摊文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是向“(纯)文学”靠拢，其预设读者不再是打工群体，而是主流文学界。不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打工小说”逐渐衰落的同时，“打工诗歌”开始崛起，且其主题惊人地一致，那就是陈述打工生活的苦难。^{[5](P15-17)}

但问题恰恰就在于：为何20世纪80年代“打工文学”内含的“希望”维度在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消失，而“苦难”主题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

三、“嵌入”与“疏离”：去组织化的打工者

在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崛起的“打工诗歌”何以在“苦难叙事”上惊人地一致，并广泛表现出强烈的怨憎情绪时，李杨将之看作是打工诗人接受文学前辈“规训”或指引的结果：将“苦难”当作一种文学写作策略，刻意凸显“苦难”以引起更大的关注，其诗人代表是

郑小琼和郭金牛。^{[5](P33-37)}如是分析自然有其道理，但也未免有失偏颇：尤其是当苦难叙事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普遍倾向或共有选择时，显然需要对之进行更有耐心的阐释。比如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当时任广东省作协副秘书长的杨克认为郑小琼太偏激、感情停留在愤怒层面上、作品粗粝时，后者对之进行了反驳：“我不知道什么叫光明或阴暗，我只看见事实。我的诗歌灰，因为我的世界是灰的。”^[19]

“我的世界是灰的”这一简洁的判断句，裸露了年轻的打工者们的生活底色。事实上，这既得到了汗牛充栋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也有来自文学想象和情境化再现的佐证。

“希望”的隐退与“苦难”的凸显，原因固然很多，比如现实层面的打工血泪，无疑就是最为确凿的悲情指认，但它显然也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三农问题和工人下岗等“底层的发现”及其带出的情感政治有着内在的关联。

众所周知，“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出路问题。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城乡的“普遍获利”，到90年代演变为城乡分化，城市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通过对接海外市场获得了快速发展，而农村尤其是内陆农村则因中国农业固有的劣势和农民日益沉重的负担而趋向衰败，“在希望的田野上”景象为日益凸显的三农问题所困扰，这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著名的《读书》杂志为此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讨论，对持续了20多年的农村改革进行了历史性的反思。如温铁军在一百年的宏观视野中将“中国问题”归结为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种资源环境制约下，“如果不能把农地超载的农业人口转移出去，则无论是现代科技等新的要素投入，还是政府的价格政策，其效益不仅都融化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往往适得其反”，这落实到“三农问题”，则可表述为“农

^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打工者为读者对象的《佛山文艺》发行量高达数十万份，宝安县文化局1988年创办的面向打工族的内部文学刊物《大鹏湾》发行量也稳居十万份以上，成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难得一见的文学景观。

民没有出路,农村得不到发展,农业也难成为独立产业”。^{[20](P8-17)}与此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为应对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以及为加入WTO做准备,我国在发展主义驱动下以效率为中心的国企“抓大放小”改革大规模发生^{[1](P55-58)},这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工人“下岗”。从国企改革结果来看,大量的下岗工人及其家庭普遍陷入生活困境,其情形又以重工业基地东北最为严峻。这只要看看近年大热的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等人的“东北叙事”就可以感知到其中的酷烈。^[21]

我国的农民和工人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同时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日益“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结果。这里所谓的“嵌入”,是指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纳入了一个史无前例又浩大无边的全球一体化进程,这一进程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意识层面的,其深刻的影响之一就是几乎每个人都必须进行新的“货币化生存”且无可逃避——这也是以金钱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一个突出面相。“嵌入”是一个现代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有人因“嵌入”而获益,有人则因此而利益受损,这取决于他们能否有效参与其中并对之加以利用。就此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和工人在相当意义上既在这一进程之中又被抛离于这一进程之外,用上述刘擎的说法就是,影响你生活的变量是遥远、陌生而难以理解的,这给许多人造成了难以估计的风险,对生活的掌控感处于莫名的威胁之中。因此,对于部分像打工文学所书写的弱势打工者而言,与“嵌入”形成对位关系的,是双重的“疏离”:他们一方面与家乡故土发生了历史性的疏离(回不去的农村),另一方面又与所在城市因各种原因发生了现实性的疏离(进不去的城市)。熟悉我国当代文学的人都知道,“进城”意味着不同于农村生活的

可能性,其初始指向完全是积极意义上的,它既是现代的诱惑,也是现代的允诺。但现实悖离乃至反转了这种充满乐观的现代化叙事及其意识形态允诺。

而之所以如此,正如我们在“打工文学”中所看到的,极其深入地嵌入到这一经济全球化进程(参与全球商品市场的生产)而同时获得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农民工,其在城市中的物质生活和社会保障状况并没有获得较农村更明显的改善,而且在身份上备受歧视^[22],他们不过是经过层层盘剥、付出超额劳动却只获得低微收入的打工者而已,在几乎一切都已货币化的消费社会,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是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新穷人”或“有缺陷的消费者”^{[23](P48)}。农民工在而不属于城市,从而与农村的贫困农民、城市的下岗工人等构成了改革时代的“底层”。这一“底层的发现”,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重大事件之一,并成为当时急剧的阶层分化和阶层失落的一个标识性存在:

“对于‘新穷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与物质的贫乏,还有最痛苦的剥夺与失落。”^[24]与此相应地,作为其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与“打工文学”相关又相继的“底层文学”的出现,悲情的“苦难叙事”则构成了二者的共同取向和特征。^{①[25-27]}

那么,对于农民工这个“被发现的底层”来说,“嵌入”不仅没有带来更多的“希望”,反而因“嵌入”带来了更多的失落、沮丧和愤懑,这对于我们理解“打工文学”以及当下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深度的“嵌入”何以没有使得他们与外部世界更为紧密却反而呈现出更深的内在裂痕和疏离感呢?我们当然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一结构性问题,但也可从文学的情境化想象中寻找其隐秘的答案。

张慧瑜曾比较了两种工人诗歌:一是来自

①关于“底层文学”,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李云雷.“底层文学”:提出问题的方式[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5):35-37;刘旭.底层叙事:从代言到自我表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张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叙述[J].文艺争鸣,2019(1):29-36.

国有工厂的老工人诗歌,二是来自民营(外资)工厂的新工人(农民工)诗歌。据他的观察,尽管都是“工人”,新、老工人之间却呈现出历史的断裂和隔膜,彼此无法分享各自的历史经验和现实伤痛^{①[28]},正如郑小琼所说:“我们的情感、身份和归属都与传统的工人完全不同。虽然农民工和工人操作着同样的机器,但是对于机器、矿井等,我们二者对于这些意象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29]之所以如此,在我们看来,是因为新工人在肉身上、情感上、意识上的“去组织化”,这可以说构成了“打工文学”怨憎与哀戚并存的一个社会历史根源。

区别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它的高度组织化:社会活动主要是在组织化过程中完成的,每个现代人都几乎无法脱离某个或多个正式或非正式组织而独立存在。^{[30](P3-4)}因此,农民工的“去组织化”是个有特定含义的说法:一方面,他们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组织结构中摆脱出来到城里打工,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规模脱离组织化的群体,另一方面,“身”居外资或民营工厂这一城市工业组织,却长期与工厂仅有劳动买卖关系而缺乏更多的社会保障等福利(打工作品常提及工人受了工伤往往得自己花钱治疗)，“心”自然不在厂里,对所在工厂不仅没有起码的依靠、归属感且对流水线生活充满了厌倦与憎恨(如郑小琼和许立志的诗所写),同时对作为打工阶层也缺乏自我认同,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对之予以拒斥和贬低,这一身心的分离或分裂,是一种别样的“去组织化”。

这与传统社会主义工厂的工人完全不同。在后者那里,由于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被放置在历史的主体位置上,工厂成为现代化城市的标志,工人也成为城市的主人,拥有广泛的政

治、经济、社会保障,因此在其诗歌中,出现了大量对于工业、工厂的正面描述和赞美。如梁小斌在《前额上的玫瑰》(1981年)中,把“工伤”诗化为“额上的玫瑰”,这与打工诗人的诗歌中所呈现的血淋淋的工伤形成了鲜明对比,换言之,诗意和浪漫感是属于老工人的,新工人无从分享。在梁小斌另一首诗《一颗螺丝钉的故事》(1982年)中,“我”和螺丝钉完全融为一体,生锈的螺丝钉来自于毛泽东时代的经典隐喻“革命的螺丝钉”,它是革命、工业、社会这台大机器的建设者,正说明了老工人对于工厂维持着身心的同一,即便到了改制后的国企工人那里,其诗歌也同样带有社会主义工业经验的印痕:国企工人豪迈的主体形象、工人与机器生产彼此融洽的体验,基于工友、兄弟情谊的集体意识,以及对工厂的依赖与认同。^②与此相反,“打工文学”对让人绝望的流水线工厂生活进行了客体化的观照、审视和批判,其中包括对高强度劳动、工伤和死亡的愤怒,以及对个人青春消磨易逝的伤怀,那种主客体之间的鸿沟或距离感均明白无误地标示出工人与工厂的分离,“他们无法拥有集体、群体、兄弟的感受,每个人都像高度流动的、原子化的个人”。不过,随着老工人被剥夺了历史主体的位置,而新工人只能变成被剥削和压榨的对象,这构成了新工人的命运与老工人的历史性关系。刘东指出,这种历史性的“失落”导致了处于极端弱势、全然无助的打工者真正滑落到社会的最底层。^[31]

从情感政治上,从“打工文学”的现身说法到“底层文学”的“旁观他人之痛”^[32],其苦难叙事爆发了巨大的情感能量^③,但底层打工者却未能通过集体行动将之有效、持久地转化为一种社会政治能量,以扭转对自身不利的社会地位和改善自身的生存状况,这不能不与他

①②张慧瑜. 工人的声音——老工人与新工人的相遇. 该文为作者2015年参与“历史与现状:中国工人诗歌创作”研讨会的发言,整理稿收入秦晓宇. 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C].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5.

③正如刘东感慨道:“在尽享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时,我们这些幸运的城里人,哪怕是其中最为洁身自好者,也照样脱不开潜在的愧疚……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中国当真就这么‘和平崛起’了,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一定要为连续几代数以亿计的苦力劳工,修一座最高最大的纪念碑,来铭记他们曾经付出的超常牺牲!”参见刘东. 贱民的歌唱[J]. 读书, 2005(12): 16-23.

们“每个人都像高度流动的、原子化的个人”的去组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一方面与资方有意设计的管理制度有关(如三班倒制和工人宿舍的老乡区隔制),也与新时期“去政治化”后阶级话语的被稀释并被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话语所取代有关——工人生存状况的改善,仅仅成为“个人”的生活理性规划目标,而这一目标与自身所处的阶层(级)无涉,在奋斗与自由、自我与他者等关系的理解上,他们与所谓的中产阶级其实共享了同一种生活价值观:“中国新工人主体(打工妹或打工仔)的形成,他们的斗争、独特的色彩和活力、多重的场所,不再能被描述为或者政治化为单纯的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因为在当代中国,打工主体经历着、理解着、行动着并且规划着他们的人生轨迹。”^{[33](P29)}这种彼此无关的、原子化的个人关系,在谢湘南的《呼吸》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书写中,被吊诡地转化成某种具有隐喻性的工厂宿舍日常情境:

这是五金厂106男工宿舍/……/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的/九点半//第一个铺位的人去买面条了/第二个铺位的人给人修表去了/第三个铺位的人去“拍拖”了/第四个铺位的人在门口“守着”电视/第五个铺位的人正被香烟点燃眼泪/第六个铺位的人仍然醉着张学友/第七个铺位的人和老乡聊着陕西/第八个铺位 没人/居住 还有三位先生/不知去向^{[34](P4-5)}

这或许可被看作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预言性存在和表征性符号。倘若说晚清时期史无前例地开启了社会大流动的历史序幕,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人口大迁移则是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停滞之后又重续了这一现代进程。这

是一个暗含着大希望又遍布孤离挣扎的现代进程,而“打工文学”的预言性就在于,在“离乡”的主题之下,诚如一百年前鲁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它其实揭示了人的流徙、离散既构成了“流动的现代性”的重要面向,也构成了现代人的某种无从逃遁的宿命:在陌生社会与陌生人打交道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成为社会个体主要的生活历程和生命体验,其中的悲欢,自是与传统的“乡土中国”不同^{①[35]},因而它称得上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事件”。而“打工文学”的表征性就在于,这一现代的群体性命运落到“去组织化”的个体身上,由于他们大多缺乏介于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物质与精神层面的组织性联结与保护(归属和认同),则意味着“打工”内涵、外延的极大扩展,即人人都是在越来越相似的充满竞争的劳动实践中的打工者——这无疑蕴含着一种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历史性重构。而打工文学透过“苦难的叙事”或刘东所称的“贱民的歌唱”,创造了一个独特而普遍的表象世界,记录了打工者各不相同而又大致相通的心理、情感和生活情境^②,从而也预示了一个新的在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理性与情感的张力之间流离漂浮、摇摆挣扎的无根个人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 [1]玛丽·E·加拉格尔. 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M]. 郁建兴, 肖扬东,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 [2]王炳中. 论“十七年”山水游记中的“社会主义风景”[J]. 文学评论, 2022(1): 179-187.
- [3]郑永年. 中国需要第二次入世[R/OL]. (2021-12-23) [2022-12-10].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公众号.
- [4]吕新雨. “民工潮”的问题意识[J]. 读书, 2003(10):

①鲁迅1898年5月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后在给二弟周作人的信中写道:“行人于斜阳将坠之时, 暝色逼人, 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 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 一念及家乡万里, 老亲弱弟, ……真觉柔肠欲断, 涕不可遏。”参见鲁迅. 夏剑生杂记[M]//集外集拾遗补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495.

②如韩歆这样写《高楼上劳作的电焊工》:“对那个比二十八层大厦还要高出一层的/电焊工, 地面上交织如蛛网的汽车喇叭声/太无力了/……只懂得用火焰融化世界/笨拙的火, 不会玩花样的火/缔造了城市却被城市踩在目光下的火/只有此时, 你才凌驾于城市之上/凌驾于危险之上……/而你的心在那么高的地方跳动/一定会让你远在家乡的妻子听见的吧/冰冷的早上她从地窖里取出藏的红薯/好像捧着滚烫的心/北风吹过时, 黄昏降临/黄昏是烧好的红薯, 砸在二十八层高楼上/有一点疼。”参见杨宏海. 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散文·诗歌卷)[C].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7: 270-271.

52-61.

[5]李杨. “打工”如何“文学”? “文学”如何“打工”——“打工文学”的知识谱系学[M]//李杨. 深圳新文学大系: “打工文学卷”.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20.

[6]钟晓毅. 在南方的阅读: 粤小说论稿(1978—1996)[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7]项飙对谈迈克尔·桑德尔: 我们如何摆脱“优绩主义”[R/OL]. (2022-3-24)[2022-12-11]. “澎湃新闻”公众号.

[8]瑞雪·墨菲. 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M]. 黄涛, 王静,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9]刘擎. 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上): 美国大选与民主危机[R/OL]. (2021-03-22)[2022-12-13]. “上海书评”公众号.

[10]成希, 潘晓凌, 郑小琼: 在诗人与打工妹之间[N]. 南方周末, 2007-06-28.

[11]王斑. 历史与记忆: 全球现代性的质疑[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

[12]郑小琼. 铁·塑料厂[M]//杨宏海. 《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散文·诗歌卷).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7.

[13]张伟明. 我们INT[M]//李杨. 深圳新文学大系: “打工文学”卷.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20.

[14]聂辉华, 李金波. 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J]. 经济学(季刊), 2007(1): 75-90.

[15]李南玲. 深圳外来工一年邮政汇出89.5亿, 占总额的68.01%[R/OL]. (2005-02-04)[2022-12-08]. <https://news.sina.com.cn/o/2005-02-04/09535043345s.shtml>.

[16]杨宏海. 文化视野中的广东“打工文学”[J]. 粤海风, 2000(6): 46-49.

[17]杨宏海. 打工群体与文化权益[N]. 文艺报, 2005-11-03(009).

[18]张颐武. 在“中国梦”的面前回应挑战——“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的再思考[J]. 中关村, 2006(8): 104-106.

[19]郭珊. “我们并不沉默, 只是没有人倾听”[N]. 南

方日报, 2007-06-17(009).

[20]温铁军. “三农问题”: 世纪末的反思[M]//改革: 反思与推进.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21]杨立青. 双雪涛小说中的“东北”及其他[J]. 扬子江评论, 2019(1): 69-75.

[22]刘虹. 打工的名字[J]. 绿风, 2003(5): 2.

[23]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M]. 郭楠,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

[24]刘昕亭. 新穷人. 新工作. 新政治[J]. 中国图书评论, 2012(4): 39-46.

[25]李云雷. “底层文学”: 提出问题的方式[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1(5): 35-37.

[26]刘旭. 底层叙事: 从代言到自我表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27]张均.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叙述[J]. 文艺争鸣, 2019(1): 29-36.

[28]秦晓宇. 我的诗篇: 当代工人诗典[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29]周哲. 刺痛这个柔软的时代: 昨夜, 19名工人诗人在北京向世界朗读[R/OL]. (2015-02-03)[2022-12-18]. “澎湃新闻”公众号.

[30]切斯特·巴纳德. 经理人员的职能[M]. 王永贵,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31]刘东. 贱民的歌唱[J]. 读书, 2005(12): 16-23.

[32]罗岗, 田延. 旁观他人之痛——“新工人诗歌”“底层文学”与当下中国的精神状况[J]. 文艺争鸣, 2020(9): 28-38.

[33]潘毅. “阶级”在中国消失了吗? 中国新一代工人的命运[M]//孙民乐. 深圳新文学大系: “底层文学”卷.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20.

[34]谢湘南. 零点的搬运工[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35]鲁迅. 夏剑生杂记[M]//集外集拾遗补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责任编辑 刘红娟】

Migrant Literature as Prophecy and Representation

YANG Liqing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 in China,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export-oriented econom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such as Shenzhen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a leapfrog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attracted tens of millions of migrant workers,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tide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1980s. Naturally,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se workers aroused wide concern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migrant literature” is exactly a definite literary response. As revealed in works such as the short story *Late at Night, There’s a Man by the Sea*, “Migrant literature” tells the stories of migrant workers, presenting their struggles and hopes of working in cities, creating a unique and universal visual world, and showing the modern people’s migratory and discrete fate. In the late 1990s, while “migrant novels” gradually declined, “migrant poetry” began to rise with an astonishingly consistent theme, stating the hardship of

working life and being the “singing of the bottom class”.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issues such as migrant worker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had profound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backgrounds, in a sense a result of China’s increasing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As “DE-organized” individuals who are both embedded in and detached from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migrant workers actually correspon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world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narrative of suffering” and literary expression constructed by their psychology, emotions, and life situations are a prophecy as well as representation of the arrival of an era of rootless individuals who drift and struggl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rural and urban, and rational and emotional tensions.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Shenzhen; migrant workers; migrant literature; de-organize; narrative of suffering

(上接第135页)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period, and showed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aoism” and “Material”, they each formed a relatively simple view of equality; since this view of equality is not enough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er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ideal equality. In terms of concept, and in the process of putting it into social practice, a theoret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eople-oriented overall equality concept and the individual-oriented procedural equality concept has gradually formed. Some people simply think that China’s consistent thought of equality in ancient times is only a social expectation that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in the spiritual level, while ignoring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equality thought; It has also been argued that the ancient western concept of equality, especially after the Renaissance, has mad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motion of realistic equality in human nature, ethics, economy and rights. In fact, once the research field of vision is trapped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western social system that has been completely changed after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latively stable feudal system in the ancient East, it is difficult to show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problem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is paper tries to jump out of the western-oriented equal discourse system and solidified thinking mode, and re-understand the ancient Chinese and western equality views from three aspects: simple equality view, ideal equality view and early equality view, 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ancient China equality view is not a spiritual appeal divorced from reality, but a complete ideological system based 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unique China philosophical wisdom.

Keywords: ancient times; concept of equality;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evelopment climax